

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防控*



张家军^{1,2} 方庆圆²

(1.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现代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为教师负担的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 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伦理风险, 导致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异化。为此, 文章首先阐述了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伦理风险表征, 包括教师负担问题失真、人机关系主从倒置、教师隐私受到侵害、教师诉求逐渐消解。然后, 文章从技术实践的特性出发, 分析了这种风险产生的逻辑在于量化表征的数字化逻辑、算法执行的控制性逻辑、技术平台的开放性逻辑以及技术运行的自主性逻辑。最后, 文章从关注教师感知、引导技术服务、维护数据正义、回归治理初衷四个方面, 提出了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防控路径。文章通过对教师负担技术治理伦理风险的审视和溯源, 期望为技术手段更好地推动教师负担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教师负担; 技术治理; 伦理风险; 产生逻辑; 防控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23)04—0040—08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23.04.005

201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教师减负的必要性和总体要求, 指出要切实减轻教师身上的负担, 推动教师负担的政府治理, 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现阶段教师负担的治理需求, 技术手段开始为政府治理教师负担增添动力, 技术治理(Technocracy)也逐渐进入了政府治理的视野。技术治理指的是科学技术在具体的政府治理方案中的嵌入, 旨在提高治理效能, 提升社会运行的效率^[1]。虽然技术的介入能够在信息收集、信息交互、决策支撑等方面为教师负担治理提供便利, 但技术在为教师负担治理赋能的同时, 也潜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 进而导致教师负担治理环境的失衡。基于此,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教师负担技术治理过程中的伦理风险表征, 然后分析其生成逻辑, 并提出相应的防控策略, 以期推动对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理性审思。

一 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伦理风险表征

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变了当前的教育管理模式, 引发了教育问题技术治理的变革。但在技术手段同教师负担治理相耦合的过程中, 必然会引发一定的伦理风险。本研究基于技术嵌入的教师负担政府治理流程, 总结了其伦理风险表征, 具体如下:

1 数据事实异化教师负担现实: 教师负担问题失真

数据是政府展开技术治理的起点, 通过数字化的转译, 社会现实被描述和化约为数字信息进入技术体系。随后, 在“在技术治理的作用下, 从社会情境到议题再到数字, 社会和人的可能性维度一步步被化简, 信息量一步步被压缩, 直至成为一个数字, 即某个维度上敞开的定量标尺上的一点”^[2]。在数据的标尺之下, 作为复杂社会现实问题的教师负担呈现出新的表征样态。借助于广泛的数据收集终端, 教师的基本信息、工作时长、学生的成绩以及学校的升学率等要素都成为数据采集的对象。通过对不同教师的活动进行数字要素提取和关联程度分析, 技术治

理建构了可分析的数据体系,描绘了一副基于数据现实的教师负担图景。扁平化的数字语言构成了教师负担表征的符号系统,极大地简化了立体、复杂、多维的教师负担问题,使教师负担的现实样态被异化为一系列的数据结构。

教师的负担不仅仅体现在可被量化分析的客观层面,同时还体现为教师斡旋在教育类事务与非教育类事务中的主观感知和综合体验。除了展开正常的教学工作,教师还需要在一些非教育教学性工作中耗散自己的精力,并承担一定的家庭伦理职责,而作为差异性的个体,教师本身具有独立的认知判断、个体的发展期望和对压力的承受能力。由此可见,外在身份的多重性和内在发展的个体性意味着教师对自身负担的感知存在鲜明的差异。在繁杂事务之下,教师的职业热情、对工作负荷的感知、职业发展动力以及心理压力等主观认知成为数据符号难以描述和监测的对象。通过对教师负担的数据表征,结构化的数据进入了技术治理的视阈,而大量非结构性的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数据则被过滤出去,消失在数据海洋之中。由此,数据拼贴了一个技术体系中的教师负担问题现状,致使教师负担问题失真。

2 程序运作主导负担治理过程:人机关系主从倒置

在数字化的治理流程中,程序运作将治理过程拆分为结构性、程式性的环节,并通过对教师负担治理相关变量的持续监测,针对性地作出应答反应。例如,通过收集教师每天的在校时长、授课时长、备课时长以及与交流时长,在个人时间结构方面自动生成基本的教师负担现状;在系统的自主操作下,信息被自动分类投放到下一个程序中,通过对不同学校事务占用时长的比对,实时监测时间层面上教师负担的治理进度。可以说,在技术治理的视阈下,技术的工具性操作取代了对教师负担问题的治理,并在无形中被推向了政府治理活动的前台。

对教师负担问题的治理是回归教师专业性的过程,是教师的生命质量在教育类劳动过程中不断提升的过程,更是人的主体性彰显的过程。而程序的运作模式之下,技术治理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体系,发展自身的决策范式,模拟主体行动,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智慧应答和问题解决系统。在此基础上,人机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变更——人类治理主体对数据和技术的信赖逐步加深,人类治理者的主体地位也逐步让位于技术体系。法国技术哲学家 Stiegler 指出:“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技术,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为技术所利用,因而人本身就成了技术体系的伙计、附属、辅助,甚至是手段。”^[3]人利用技术治理教师负担的过程逐渐演化成了为技术所利用,致使人类治理主体在被技术理性捕获的同时主动让位于技术工具的实践,这使原本作为辅助角色的技术工具转而与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倒置,进而促使人为了技术体系的发展和技术治理的实现服务。

3 技术网络实时监察教师行动:教师隐私受到侵害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虚拟现实等技术在社会场景应用的不断突破,德国社会学家 Kucklick 提出了“微粒社会”的概念,认为现代技术为我们带来了“高密度的、更详细的认知。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自身的理解”^[4]。而作为数字时代的公民,只要教师在数字社会中生活,技术系统就能时刻捕捉到教师的行动数据。然而,数据的挖掘越全面,信息的传输越便捷,对教师数据隐私的控制就越困难。

虽然通过课堂监督设备、办公平台以及各种计量统计系统,信息技术可以对教师的行动数据进行分析,生成精准的教师工作报告,但实际上教师已然被各种数据网络所裹挟,“数据库无须任何狱卒的眼睛就能对其进行‘审查’,并且更加准确、彻底”^[5]。由此,教师在无意识中暴

露于技术网络的实时监测之下,教师的职业活动甚至是日常生活日趋透明。另外,在教师负担治理的过程中,被检测到的教师信息也极易面临泄露风险。例如,在推动智能化教师评价的过程中,政府治理主体通过师德修养、专业知识、教学能力、教研能力以及多方评价等方面能够收集到较为全面的教师个人数据,有针对性地为教师的工作减负和专业发展提出相应意见,也为技术系统广泛且深入地分析教师负担问题提供基础。但实际上,通过网络爬虫、程序代码等操作手段,大数据能够基于已有的数字信息,统整教师的基本背景、个人体征、学习经历、工作时长和类型、教学能力水平等要素。对于教师个体来说,这些个人信息是相对碎片化、匿名化的,虽然看似无法准确指向个体,但基于当前技术治理的数据体量以及高频次的数据交互,原本模糊、匿名的数据在技术系统中被填补和显现,使碎片化的个人信息能够在网络世界中准确填补出教师的数字形象。

4 技术效用偏离治理意图:教师诉求逐渐消解

在 McLuhan^[6]看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使用,人类身体、思想甚至是个体存在也在无形中被延展了,技术能够帮助人类高效、便捷地处理更复杂的社会事务。技术工具在教师负担治理过程中的深度介入,提高了治理效率,降低了治理成本,但也可能会导致技术治理的效用发生偏移,教师的真实诉求被忽略。

一方面,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结果发生偏移。虽然借助数字运算和数学模型的支撑,技术终端能够实时反馈和监测教师负担治理的结果,但实际上,这些广泛收集到的数字信息仅仅在数据运算层面满足了基础的数理逻辑,迎合了技术治理成效的评估标准。而技术治理的逻辑主要关注客观、可量化的指标,试图在特定的模型框架内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依此呈现技术手段赋能下教师负担的数据图景与治理效果。这无异于使教师负担的治理陷入了技术逻辑的漩涡,以“数据问答”代替教师负担治理实践的真实成效。由此,技术逻辑挤压了教师负担治理的本体价值,消解了教师的诉求,转而追求数字体系和技术判断在教育世界中的完满性。

另一方面,技术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极易产生不可预料的未知风险。Giddens 曾提出“人造风险”的概念,认为“人造风险”是在人类技术的发展进程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7]。算法是技术治理的重要支撑,而算法程序运行的不透明、算法决策过程的不公开以及算法治理结果的自我解释性差等弊端在技术世界中创造了一个算法黑箱,带来了相应的“人造风险”。在技术治理层面,确实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教师的客观负担进行数字化呈现,但不论是这一呈现的规则设定方式,还是数字量化评价的指标,抑或是评价指标同教师负担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都无法获知。这就意味着,一旦教师负担的数据进入技术治理的视阈,就进入了一个完全未知的虚拟空间,作为治理主体的人类无法介入、理解、预测以及评估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过程,这极易造成数字层面的虚假治理,并引发治理过程中的未知风险。

二 教师负担技术治理伦理风险的产生逻辑

针对上述教师负担技术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教师负担问题失真、人机关系主从倒置、教师隐私受到侵害、教师诉求逐渐消解伦理风险表征等问题,本研究在回溯技术深入教师负担治理实践的基础上,从技术运行过程中的数字化、控制性、开放性、自主性四个方面总结了教师负担技术治理伦理风险的产生逻辑。

1 教师负担量化表征的数字化逻辑

技术连结人与世界的现实,使人能够“显现自身并参与规定事物的存在,让真理得以从遮蔽状态到无蔽领域并带来产出”^[8]。借助技术手段的“解蔽”,作为社会事实的教师负担被技术体系显现出来,并得到重新定义。而在大数据支撑技术环境中,“人类的所有经验都被视为可进行供应的原材料,目的是转化成行为数据”^[9]。由此,教师负担问题在技术世界中被转译,以可量化、可比较、可分析的数据指标表征自身。

尽管理性的技术体系追求可测量的目标以及科学的计算结果,在对数据化的对象展开评估、指导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治理过程处于规范和有序的状态。但基于一系列评价指标,精确、可度量的评价方式也在教师面前竖起了一道“社会测尺”。一般来说,教师的绩效考核、工作时长、家校沟通频率、教育教学效果等精准量化的数据被视为度量教师负担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和群众评价教师负担技术治理成果的合理方式。然而,过于依赖数字运算的准确性,将会催生数据主义的价值判断,进而导致社会现实被数字所定义。生命意义上的教师个体被呈现在一组组抽象数据之中,在技术治理中被视为推动教师负担治理的工具,正如 Marcuse 所言:“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10]一旦教师个体被异化为数字表征的个体,教师的负担也会随之变形。基于此,我们在借用技术之眼观看教师负担问题的同时,逐渐脱离了教师负担问题的现实状况,用数字运算的“正确性”代替了教师负担问题的“真实性”。

2 算法介入教师负担治理的控制性逻辑

现代技术应用程度的逐渐加深促使人的行动范式发生相应的转向。Ellul 认为,技术已悄无声息地成为人与自然交互的中介,“成为人类必须生存其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它已代替了旧的环境,即自然的环境”^[11]。由此,技术在一切社会现实中强行介入,将一切事实、现象、工具、感知等还原为技术理性的逻辑图式,促使人们遵从既定的算法“程序”展开实践活动。而从技术体系的构成出发,算法是计算机程序得以产生和运行的基础,“是一系列问题的清晰指令,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12]。它将教师负担问题中的教师多重身份和负担产生的多重来源串联起来,在准确的数字世界中以技术逻辑推演教师负担治理实践。

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存在也存在扩张性,“技术活动自动地驱逐任何非技术活动,或者把非技术活动转化为技术活动”^[13]。通过建模分析,虽然算法给出了教师负担治理的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往往并非站在辅助决策的角度,经由高密度的数字运算和风险评估提出一系列可选择的行动,而是推送了技术体系控制下的“最优方式”。这会导致作为教师负担治理行动者的个体,出于对自身决策视阈的怀疑,选择相信算法运行的科学性,以技术体系的决策指导自身的实践。由此,人类的思考和行动范式受到影响,其处在技术系统之中,自身也会被技术因素所改变。随着算法的不断介入,技术对教师负担治理过程的控制不断增强,技术的辅助角色也在无形中同治理主体易位,依循着固定算法逻辑推进的教师负担治理活动逐渐走向僵化,治理主体与教师之间也就形成了一个“理性至上”“效率至上”的技术环境。

3 技术内嵌工作场域的开放性逻辑

“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14],它已经作为一种价值表征物进入交换的市场。同时,技术治理的实现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也为信息的自由交换提供了开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一旦数据成为可交换的商品,就必然脱离数据收集的初始目的而被用于二次开发和使用,作为商品的数

据也因其匿名性减少了相应的道德束缚。随着技术手段与校园资源相整合的逐渐紧密,智慧校园、数字校园为技术治理的嵌入提供了开放的空间条件。这就意味着,只要懂得算法语言的编写和智能程序的架构,就能介入教师负担的技术治理过程。然而,若智能技术的开发没有边界,缺少对其使用的伦理约束,必将导致教师负担的技术治理因缺乏合理管控而陷入混乱。

随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技术终端的普及和信息传输速度的提升,教师负担治理的时空区隔被打破,使负担的治理行动进入了“液化”状态^[15],技术平台同教师工作环境的深入结合也逐渐打开了教师工作场域公开化的窗口。例如,校园内的监控设备完整记录了教师的校园活动;电子教案的普及、线上评教的开展以及校园局域网对教师电子设备网页访问记录的实时监视,使教师在工作时段内的工作方式和教学需求等教育事务也被全程记录下来,并通过公开的网络窗口,受到实时的观测和检查。同时,过于自由的技术开发体系也使技术工具成为教师负担治理过程中的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被收集到的教师个人信息在各个治理主体和治理参与者之间流转,看似是以数据共享、社会共治的角度提升数据的利用率,但实际上,教师逐渐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决定权和拥有权,成为技术社会中的透明个体。教师私人化的工作过程进入公共的视野,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凝视下被多次解读,而这将会导致政府在追求治理成效的同时引发隐私伦理的失衡和教师主体性的失落。

4 教师负担治理结果数据自证的自主性逻辑

技术体系的运行具有自主维持和自我强化的特质。量化的模式不仅构成了现实社会在技术世界中的呈现方式,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技术秩序运行的逻辑。通过提出假设、拆分框架、抓取数据、验证假设的运行逻辑,技术治理不断以数据事实验证技术策略的合理性,进而实现技术运行的合法性。而技术自身是一种自主性的存在,它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满足,并具有自己特殊的法则和决定论^[16]。技术的自主性决定了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目的并不在于回归育人的教育世界,而在于数据自证的技术生产。

正是由于技术的自主性,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过程形成了治理闭环。逻辑运行的完整性和固定性意味着人类无法以治理主体的身份深度参与到智能系统的运算过程当中,也无法对技术运行的过程进行透明化监督,更难以通过人为介入的方式对教师负担的治理过程进行修正。数据为王、效率至上的运行逻辑,促使教师负担的治理走向了技术理性的胜利。例如,教师的工作时长被视为教师负担的客观表征,那么技术治理就通过监测教师工作时间的长短判断治理手段的有效性。这种技术理性深刻地描摹了教师负担治理的数字样态——经过技术体系内部的多次拆解和重组,教师负担数据信息逐渐同现实社会中教师的减负诉求相分途,技术治理距离教育现实越来越远,而距离技术逻辑的合法性则越来越近。由此,社会问题的呈现轨道被技术秩序限定,社会却自顾自地提问题,两者的张力中埋藏了危机^[17]。技术闭环之下的教师负担治理同现实的教师负担问题渐行渐远,极易引发技术观察的假象和技术运行的失范。

三 教师负担技术治理伦理风险的防控路径

针对技术赋能教师负担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及其产生根源,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防控路径。考虑到政府主导之下的教师负担技术治理旨在借助技术手段切实减轻教师负担,因此本研究认为政府治理主体应当从问题事实和教师本体出发,关注教师负担的主观感知,引导技术工具服务主体需求,全域联通维护数据使用正义,回归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初衷。

1 关注教师负担主观感知

教师负担是“在教育工作活动过程中,教师所承受的教育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18]。因此,教师负担问题具有客观表征和主观感知的二重性。在客观上,教师负担可以被描述为工作类型的多少、工作量的大小、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成效的高低等维度,以可测量的方式进行描述。但教师在主观层面上的精神压力、应对繁杂事务时所耗费的精力、工作中的情感投入、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的失衡以及对职业发展的需求同职业现状之间的不协调等要素,则难以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表征,只能通过文字描述或质性总结的方式加以呈现。

为此,教师负担问题的技术治理必须树立正确的主体观,从教师自身的切实感知出发,关照教师负担的差异性、现实性、主观性。例如,建立教师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机制,从教师职业的社会性、工作活动的使命性以及教师个人的家庭伦理性等方面出发,理解教师负担的主要生成原因和工作压力现状;同时,应在校内设立专门的教师负担对话部门,发挥教师团体内部的职业共情优势,以文本报告的形式传递一线教师的生存诉求。只有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兼顾教师负担治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才能更加全面、生动地描述教师负担现状。

2 引导技术工具服务教师需求

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撬动了教师负担治理的技术杠杆,一旦杠杆撬过了头,必然会导致效率追求大于本质纾解的价值失衡,引发治理过程中人被技术所控制的风险。因此,政府治理主体应当聚焦教师的主责主业,将技术工具置于服务和辅助角色,了解教师在工作中所面对的困境和压力;合理引导技术手段在教师负担治理过程中的使用,以保证技术工具能切实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更好地服务教师的工作需求和发展诉求。

以智能技术为例,通过将智能技术同教育实践相结合,AI教师、智慧学习、智慧课堂、智慧校园等形式的出现直接开辟了“智能+教育”的新模式,推动了传统教学关系的变革。在该模式下,以机器终端为中介,教师能够清晰地追踪到每位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另外,通过数据结构和实时观察,智能技术能够帮助教师实现课堂教学的精准管理,并在监测学生课堂学习表现过程中适当调整课程进度和课业难度,有效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同时也提高了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AI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一对一辅导,有助于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3 全域联通维护教师负担数据使用正义

2016年4月,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基础上,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19],传递出“数据正义”(Data Justice)的技术使用理念。这一理念为教师负担治理的数据使用原则提供了现实保障。数据化贯穿了教师负担技术治理从收集、存储到分析使用的全过程,也在无形中为数据使用的多方监督提供了全面敞开的透明化视角。基于这一技术使用观念,在现代化的技术治理网络中,政府主体应当以“数据匿名”和“过程公开”为原则,维护教师负担治理过程中的数据正义。

在“数据匿名”方面,从教师数据收集的源头出发,保障个体在面对数据收集时的知情权,尊重教师的主体意志;将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访问权限和数据隐私保护写进技术程序;在算法层面与数据访问者达成协定,防止技术治理过程中对数据的二次开发和滥用。同时,在学校的教师负担治理实践中,通过以编号代替教师的个人身份,未经教师本人允许不公开工作视频等方式,防止教师的个人数据泄露。

在“过程公开”方面,利用全面敞开的信息平台,在开放的技术环境中引入全域监督体系,将技术治理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合理公开,从算法透明走向治理透明。而治理的本质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0]。因此,应当将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引入教师负担治理,将技术治理的过程呈现在公众和各利益相关者面前,推动社会形成有效的技术治理监督网络,打破技术治理的算法黑箱。

4 回归教师负担技术治理初衷

教师是负担问题的发生主体,同时也是具有自主发展意志的主体。但对技术效用的过度追求有可能会产生偏离负担治理初衷的风险,并在无形之中忽视教师作为人的主体性,从而形成教师“不在场”的负担治理。因此,教师负担的技术治理应当回应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的真实需求,关注教师对减负的真实诉求和教师职业的育人职责,回归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初衷,为教师营造一个良好的、纯粹的教育教学环境,激发教师的教学活力。

为此,政府治理部门应当以内生性的教师减负替代技术表征的教师减负,平衡教师诉求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关系,实现教师负担技术治理对教师主体发展的真实关注与回应;将技术手段视为教师负担治理的客体化补充,为智能时代的教师减负提供可实现的技术基础;在发挥技术手段自身优势的同时,认识到技术手段自身的不足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伦理失范,将技术手段的使用置于可掌控的范围内,为教师负担治理进行适度赋能;明确利用技术手段展开教师负担治理的意义和目的,形成完善的技术监督体系,优化治理架构,避免产生教师负担技术治理过程的异化。

四 结语

技术的嵌入为教师负担治理提供了从事实把握到决策厘定再到实践预测的全方面的技术支持,但对技术的不当使用和对技术工具的过度依赖将会导致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的切实负担被过度数据化,使技术理性同价值理性悄无声息地发生易位。可见,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为教师负担政府治理有效赋能的同时,也导致了伦理风险的产生。为此,需要剖析技术支持下教师负担政府治理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并提出相应的防控路径,才能更好地促使技术手段向教师减负助力,激发教师的工作活力。由此,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对教师负担技术治理的伦理风险进行了探索,期望能够为技术赋能教师减负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张勇,陈恩伦,刘佳.学校教育生态的技术治理审思[J].中国教育学报,2021,(4):17-21.
- [2]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J].社会,2018,(3):46-78.
- [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裴程译.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9.
- [4](德)克里斯托夫·库克里克著.黄昆,夏柯译.微粒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前言VII.
- [5](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8、127.
- [6](加)洛根著.何道宽译.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7.
- [7](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云红译.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南昌:江西出版社,2001:23.
- [8]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52.

- [9]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 New York: Profile Books, 2019: 19.
- [10] (美) 马尔库塞著. 张峰, 吕世平译. 单向度的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54.
- [11]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2008: 120.
- [12] 汝绪华. 算法政治: 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8, (6): 27-38.
- [13] 黄欣荣, 王英. 埃吕尔的自主技术论[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3, (4): 41-47.
- [14] 薛孚, 陈红兵. 大数据隐私伦理问题探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 (2): 44-48.
- [15] 向玉琼.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J]. 探索, 2022, (2): 153-163.
- [16]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134.
- [17] 彭亚平. 照看社会: 技术治理的思想素描[J]. 社会学研究, 2020, (6): 212-236、246.
- [18] 张家军, 闫君子. 中小学教师负担: 减与增的辩证法[J]. 教育研究, 2022, (5): 149-159.
- [19] 何玉颜.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解读及其对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的启示[J]. 图书情报导刊, 2018, (11): 67-72.
- [20]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 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 2001, (9): 40-44.

The Ethical Risk of Technocracy of Teachers' Burden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ZHANG Jia-jun^{1,2} FANG Qing-yuan²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Key Research Institute in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modern technologies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a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eachers' burden, but it also brings corresponding ethical risks, which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cracy of teachers' burden.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ly expound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thical risks of technocracy of teachers' burden, which included the distortion of teachers' burden, the inversion of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the violation of teachers' privacy, and the gradual decomposition of teachers' real demands. Then,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practice, the paper analyzed that the logic of risk generation lay in the digital logic of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the control logic of algorithm execution, the open logic of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the autonomous logic of technology oper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th of technocracy of teachers' burden from four aspect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eachers' perception, guiding technology services, maintaining data justice and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governance. By examining and tracing the ethical risks of technocracy of teachers' burden, this paper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chnological means to better promote the governance of teachers' burden.

Keywords: teachers' burden; technocracy; ethical risk; generation log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th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0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小学教师减负的效果测度与治理长效机制研究”(课题编号: BHA2001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家军,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社会学, 邮箱为 zhangjj51668@126.com。

收稿日期: 2022 年 9 月 5 日

编辑: 小时